

目 录

(一九八七年九月第四辑)

- 赤胆忠心 无私无畏.....赵秀甫 (1)
- 我所知道的冯剑仇烈士.....袁国用口述 陈振宇整理 (8)
- 郑大信在长垣.....邢范之 (13)
- 济世活人的女医师.....陈振宇 (15)
- 长垣敌工站的建立与活动.....魏怀章 (17)
- 对日本法西斯新一场大屠杀的回忆.....许佳陆 (34)
- 回忆日寇血洗长垣城.....陈 述 (42)
- 国民党长垣县党部组织概况.....李绚如 蔡英华 (54)
- 国民党在长垣城内的驻军情况.....毛清新 (68)
- 伪匪刘富山盘踞长垣的活动情况.....毛清新 (70)
- 长垣人民复堤斗争纪实.....魏怀章 (73)
- 后大郭惨案.....孟宪中 (77)
- 长垣县工商联的衍变及其作用.....贾庆生 (81)
- 长垣邮政初建.....蔡英华 (84)
- 长滑天理教会首领起义的始末.....蔡国政 (86)
- 基督教在长垣的活动情况.....陈 述 (91)
- 姬七两打铁炉寨.....蔡国政 段玉霄 (94)
- 火烧戚家楼.....麻际东 戚永梅 (97)
- 宜丘寺及宜丘寺学校.....周景松 (99)

太行堤·溢洪堰·天然文岩渠	孟宪廷 (103)
昔日老岸镇	钟拯民 (105)
长垣先贤蘧伯玉与蘧公祠	乔国韬 (106)
兵部尚书李化龙及其有关资料	李香泉整理 (112)
李化龙爱才不爱财	乔国韬 (120)
布衣翰林张逢春	靳鸿业 张智臣 (122)
安史之乱后的刘玄佐、韩弘	陈振宇 (125)
长垣县部分古墓葬简介	李建新 (128)
长垣东街顿家书铺	顿智口述 香泉整理 (132)
“油馍红脸” 尚天增	郭培修 (133)
“三善遗徽”	靳鸿业 张智臣 (134)
旧城之塔	赵子英 (119)
一九三三年洪水围困中的长垣城 (照片)	(封二)
一九三三年洪水冲决大堤的情景 (照片)	(封三)
洪水漫流, 淹没了田园村庄 (照片)	(封三)

赤胆忠心 无私无畏

——忆伯父赵子厚

赵 秀 甫

二伯父赵子厚（原名赵爰民），一九一九年出生于长垣县西赵堤村一个农民家里，青年时就在学校就接受革命思想教育。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我村组织、建立了全县第一个党支部，任支部委员、村长，翌年任第二任党支部书记、区委组织委员、正副书记，后调任滨河县武委会副主任，一九四五年任长垣县武委会副主任，领导坚持地方武装斗争，一九四八年随军南下，先后在江西、贵州省任县武装部长、县土改工作团副团长、县委书记、安顺地区检察院检察长、地监委书记、县委第一书记，一九六四年任贵州省安顺地区副专员。十年内乱中，被谋害于贵州省平坝县李家冲山洞之中，终年五十岁。

一九三六年，伯父在家念了二年私塾后考入滑县高平小学读书，当时任教的郭灿章老师就是早期的地下共产党员，在他的教导下，使其初步懂得了革命的真理，接受了马列主义。一九三八年，经本村的地下党员赵善文、赵文振同志介绍，我伯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他们在村中经串连又发展介绍了一批党员，经上级批准，在我村建立了地下党支部，伯父被选为支部委员，后任支部书记。从此，我村有了地下党

组织。我村紧临黄河大堤，地沙盐碱，土质瘠薄，主粮绝收年成极多，加之伪政权的压榨，地富盘剥，天灾人祸，致使农民生活异常贫困，穷人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救星共产党。

自有了党的组织，穷人有了主心骨，有了指望，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把伪村长赶下了台，伯父赵子厚当了西赵堤村长，他团结、依靠贫苦农民，抗捐、抗粮，明争暗斗。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我华北大好河山，人民生灵涂炭，抗日救国的烈火在我伯父心中燃烧。三八年，伯父抛家舍产，卖掉了仅有的八石黄豆，买了一把盒子枪，接着又动员党员和群众捐款捐物，只身孤胆，扮成商贩，过黄河到山东曹州买了枪支弹药，并同本村赵善交、赵文振、赵文平等同志一起，创建起了我县第一个由党领导的地下武装，从此进入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民兵组织不断发展壮大，非常活跃，组织了尖刀班、敢死队、夜虎侦察组(后改为模范班)等，伯父曾数次带领民兵，夜袭敌巢，截击日寇、伪军、汉奸、恶霸，为民除害，当时敌人称呼我村为“暗杀团”。从而迫使伪镇公所和日伪人员不敢肆意到我村骚扰、抢劫，给邻村也壮了胆。一九四零年十月的一天，伯父正吃晚饭，听说敌伪司令杨百广派的抢粮队，在周围村庄进行罪恶活动，行至我村北地小渠边，伯父把饭碗一放，迅速集合起民兵百余人进行伏击，迫使抢粮队全部交械，这次伏击缴获的武器弹药武装了民兵，粮食分给了贫民百姓。我村地下武装的活动，为四邻八村树立了榜样，周围村庄随后也相继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初步形成了一个地下共产党的民兵活动网。以此为基础，在赵堤一带成立了几县交界处的第八革命区。一九三九年，伯父正式脱产到区

委任职。从此他怀着一颗抗日救国的赤心，舍生忘死积极领导游击战争。上级领导同志对我老区的游击队伍非常重视，经常和随行人员到我村检查工作，并专派县里干部住我家对伯父们增援。

一九四二年底（古历），党根据形势的需要，在长垣、滑县、濮阳、山东的东明等县交界沿黄河两岸建立了滨河县，伯父深得党和人民的信任，不久，从区委书记调任滨河县武委会副主任，直接领导全县的地方武装，对敌斗争，肩负着抗日寇、除恶霸、清伪奸、保卫县政权、巩固发展我军地盘的任务，他领导着全县大队、各区队、村连队，都是帅先行动，既挂帅又出征。为狠狠打击敌人，他不管任何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风里来，雨里去，出没于滨河、长垣，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无数次截击日寇敌伪。因此，敌人对他怕的要死，恨的要命。一九四六年十月，伪司令董凤海带领人马五百，包围我村庄，捉拿抗日骨干分子。当时滨河县主要负责人大部分在我村隐蔽，身为地下武装领导的伯父，肩负着保卫领导、保护村庄的双重任务，他沉着机智，明察果断，一面安排领导和群众疏散，一面组织全村民兵和青壮年抵抗，土枪土炮架在街头巷尾，广大军民磨拳擦掌，等待敌人进村决战。伪司令发现村中早有准备，防备甚严，敌人不敢贸然进攻。从而保护了党的干部，大长了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勇气，大灭了敌伪的威风。又是次年的十月，长滑日寇和伪军上千人，分几路合击滨河老区，伯父带领八区队追截南路敌人，夺回被赶的数村无辜群众，使其过堤转危为安，小渠惨案没有大伤南路百姓。

抗日后期，滨河县已不存在，伯父又在长垣县任武委会

副主任，他带领县武装主力，不仅活动在本县，还听令支援外地，到内黄的北上堤，滑县的八里营、桑村，长洲同善人周旋。一次他同几个战友去桑村赶集，敌人司令部门前站岗两岗，趁站岗伪兵不备，一使眼色齐下手，将岗兵结果性命，拿了枪就溜，院里敌人出动抓他几个，伯父对空打枪，集前大乱，敌大队人马追出村外，伯父一行几人已无踪影，亲眼看见敌人回去，二里远的墓头又响起引蛇出洞的枪声。他的游击战扬名白条河两岸，当时老铁路线以东，群众受到他鼓舞，称“神枪手黑赵”，敌人闻之丧胆，称“黑赵老虎兵，闹着要性命”。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对我解放区大举进攻，一时浓云密布，一片白色恐怖，对我老八区，特别对我村庄进行多次围剿，为抓到我伯父等共产党人，对我家数次抄抢，一家人改名换姓，四处逃散，逃跑中大伯父背着四堂姐，险些被敌人抓住，含泪将亲女丢到棉花丛中。一九四六年冬，我党从河北运回两车油墨，俩车夫和压运员赶车夜行北杨庄东地，被当地宋庄土匪头大爱掳走，将三同志绥门蹲设并暗害。伯父得信后义愤填膺，趁杨庄一带唱戏时，在台下捉住匪首当堂击毙，为民除了一大害。一九四七年秋，伯父北上堤参加整党，派我父赵良民到八区保卫根据地，一天晚上，我父带领侦察班去敌占区的黄二村执行任务，谁知道父亲的行动，敌人发觉，一班人进村后被敌人暗枪打散，寡不敌众，喊杀声中仇恨的子弹打断了父亲的腿，落入敌手。伯父闻讯带队百之外奔援，黎明前追上，但父亲已被敌人用牛套拖拉双腿，直拉到数十里外的九棘英勇就义。因父亲受伤后英勇顽抗大骂匪首和国民党，敌人报复，将他的尸体钉到墙上。父们打散敌人，含泪将父亲运家安葬。在那艰苦的岁月里

更增添了他为祖国解放奋斗终生的力量，为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他带队南边打到封邱、延津，直到开封郊区，西边到京汉铁路，北边到清丰、内黄，东边到山东省东明、菏泽，方圆几百里都有他战斗的足迹。

一九四八年，在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大军南下的号角下，他以一个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怀着一颗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离开了他战斗多年的故乡，辞别了亲友，愉快的踏上了南下的征途。过江后先安排在江西任过几个月的县人武部长，听令又南进贵州。一九五零年安排在清镇县武装部工作，协助地方剿匪建政。当时清镇一带土匪猖獗，他身先士卒，带队入山清匪，团结广大战士，为打顽匪身负三处重伤，左臂打断仍坚持阵地不下火线，终歼顽匪才下战场。在反封建斗争中，他担任贵州省罗甸县土改工作团副团长，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偏僻山区开展反封建、清匪反霸斗争，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面对这一新的任务，他认真学习党的民族政策，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开展土改运动，打开了局面，巩固了政权。在贵州几十年来，先后任清镇县委书记，安顺地区检察院检察长，地监委书记，平坝县委书记。他在紧张的地方工作中，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热情，他在平坝县任职六年中，对工作兢兢业业，使该县农业连年丰产，为此，国务院发奖表彰。一九六四年，伯父调任安顺地区副专员，从四八年至六九年二十一年中，从未回过一趟家，上北京开会，途经新乡，都未回家，家中老人、孩子安排大伯、四叔照管，土地让别人代耕，一九六五年爷爷从病倒到去世，多次电告，都未回来，当时我劝他公私兼顾，他用坚强的目光盯着我说：“秀甫，你还小，你要知道，共产

党人，只有无私，才能无畏，不能只考虑自己那小家庭，要多考虑国家大事才算得真共产党呢。”他心里有党有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爱民如子，一九六零年冬，他下平坝县东平区检查工作，路遇一贫苦老人饿倒在地，急忙扶起弄清情况后，从自己身上拿出5元钱买了一大兜食品送到家中。回机关后，立即召开县委扩大会，让各区、社同志深入各户落实情况，约法三章：眼前以救灾为主；宣传党的政策、稳定民心；在此基础上，开展生产运动，以丰补欠。因此，三年困难时期，该县没有发现饿死人现象。农业一直处于稳产高产，一九六三年底，还有力地支援了我们河南的延津、长垣等县的救灾工作。家乡父老乡亲灾民也吃上了他的劳动成果。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革十年内乱中，伯父同全国的领导干部同遭其难，被打成所谓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土皇帝等，遭到批斗和人身摧残。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用游斗车从安顺地区揪回平坝进行残酷斗争，于五月十一日夜被搞失踪，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三日发现被谋害于离平坝县城六七里的李家冲山洞中。中共贵州省委于一九七九年元月五日，成立了赵子厚致丧委员会，于元月十八日在安顺地委礼堂召开了千人大会，沉痛追悼文革中惨死的赵子厚伯父，安顺地区专员张广幽同志为其致了悼词，悼词中评价：赵子厚同志一生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作风正派，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对党忠诚，事业心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党的事业埋头拉车永不松套，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作出显著成绩。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他的不幸被害使我党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我们感到非常悲痛。挥泪寄哀思，四化慰忠魂，赵子厚同志安息吧！

附：长垣县第一个农村地下党支部

长垣县城东北二十五公里，鲁、豫接壤，濮、长、东、滑交界处有一个较大的村庄——西赵堤（即西堤）。西堤北靠方圆数十里的小渠坡，东临千里黄河长堤，地势低洼，土质盐碱，自古以来，近两千口人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三十年代帝、伪、顽、杂的敲榨，地富的盘剥，激起全村绝大多数村民的反抗。值此，我们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冲破敌人的严密控制，夜聚明散，走东家串西家，散播着中国共产党推翻帝、官、封的革命种子，以村救国会成员骨干为对象，在西堤村首先开展了地下活动。当时太行山革命区在滑县高平开办抗日骨干训练班，西堤有赵善交、赵存振参加，并接受发展创建党组织的任务。二人连夜还家，即秘密串连，在救国会成员中择优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在赵善交的主持下，地下党员聚集在隐蔽处多次召开会议，成立自己的组织，并推选出以赵善交为首的西堤党支部成员。一九三八年，经上级批准，建立了这一地带第一个农村党组织——西赵堤地下党支部。

西堤村自有了党组织，穷人有了主心骨，在党支部的领导下，相继又创建了地下武装——村自卫民兵队（枪班、武装班、模范班、后演变为民兵），继而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这支地下游击组织，在党支部成员赵文振、赵善交、赵爱民等同志的带领下，曾数次夜袭敌巢，截击日、

（下转第72页）

我所知道的冯剑仇烈士

袁国用口述 陈振宇整理

在那炮火纷飞，硝烟弥漫，民不聊生的日伪统治时期。长（垣）、东（明）大地上，有这样一个人，他的衣着多变，有时是一身穿着土布粗衣的农民，转瞬间又是头戴礼帽，身穿长袍的大商人。随身带有上写“东明县小李庄李荣华”的“良民证”。这个化名李荣华的人，正是优秀共产党员，中共滨河县敌工站站长冯剑仇同志。

冯剑仇，名瑞峨，化名李荣华，陕西耀县人。少有才华，性豪放，智勇双全，早年参加革命。

一九三九年春，剑仇同志奉华北民军司令员朱程（朱政策）的命令，来长垣、东明一带扩大武装。同来的有民军十九支队队长罗晓辉、刘中道等十余人，以政工队的名誉住在长垣县城内南街“谷太兴”布庄院内。因日伪盘踞县城，白天不便出动，张贴标语，宣传抗日，联络有志之士，扩大抗日力量，只好夜间进行。

后来城里空气越来越紧张，政工队就转移到东明城里，改为支队部，住在郝家大院，任务仍是扩军。东明李庆堂（现任郑州市劳动局局长）提出线索，吕陵店一带，有几股土匪可以收编。呈请上级批准后，命剑仇、李庆斋（现在开封工作）和我去吕陵（庆斋的家）做收编工作。经过宣传抗

日政策，很快收编了一百多人，五、六十条枪。随后马上去东明买布做号衣(军装)，每人一套。后来由于对日伪封锁太严，给养一时中断(来时带的钱已用完)。吕陵是丁树本的地盘，他是一个真反共假联合的顽固分子。虽在国共合作时期，他却不准我们就地派粮，同时只准许我们停留半年。为了统战，当时不便和他闹翻。一百多人，用度无着，是个大事。李庆斋知道临近的岗峰区孙区长，是个有民族气节的人，决定到他那里去借款。李庆斋是本地人，不便出头，由剑仇和我同往。

到区部后，他的卫队不叫进门，剑仇说：“请你转告孙区长，就说有两个朋友前来拜访。”这样他才让我们进去。当时孙区长对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存有戒心，剑仇未等孙区长让座就坐了。紧接着说：“我俩想找孙区长谈点事，不知这里是否方便？”孙区长沉着脸一字一板的说：“我的弟兄们都是心腹人，二位但说无妨。”剑仇开门见山的说：“我们是华北民军的人。听说孙区长很够朋友，虽给日伪办事，但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事出无奈。现在，我们有一百多名弟兄，在你的临近地方驻防，给养一时无着，想请区长帮个忙，不知可否？”剑仇接着又说：“抗日的道理和政策，无需多讲，区长自然明白。如果区长有困难的话，我们就此告辞，如果留而不放，悉由尊便：究竟何去何从，还望区长三思。”孙区长听了后，脸上的阴云才有点放晴，少加思索后，说：“好吧！既然二位看得起兄弟，有困难，找来了，我孙某岂能坐视不理。请二位稍事休息，由兄弟给贵军筹备。”下午就送去三千斤小米。

四月间，支队部其他人员先期转移到北坝，后由剑仇、

庆斋我们三个人带队也开往北坝，准备进入太行山整编。当时的一百多人，全是乌合之众，鱼龙混杂，思想混乱。在我们三人带队去北坝的路上，有几个土匪头子，利用士兵不愿离家乡的思想，于当夜突然发起了兵变。幸亏有人给我们送了信，才幸免于难。第二天，我们去北坝向支部汇报了兵变的经过。当天下午，支队部就离开了北坝。罗晓辉、冯剑仇、刘中连等人，从内黄通过封索线，迂回进入太行山。我和庆斋、庆堂等去滑县境内的孟庄、大草一带，隐避活动。

十多天后，剑仇又受命到滑县扩军。这次是依靠当地的会道门头子李玉卿、张子良等组织人马。其结果同上次一样，功亏一篑。

两次扩军的失败，一是因为敌人的封索，经济困难。二是政治思想工作跟不上去。看来只靠吃现成饭是不行的。

时间大概过了一个月左右，冯再次出山，到东明李庆斋家，由公开转入地下。以商人李荣华的名字，在东明、长垣一带活动。实际是八路军东、长、封、兰四县办事处的人和组织人。

四零年，日伪扫荡频仍，环境恶化，剑仇心急如焚，同时得了眼疾，因日伪封索太严，又无良医良药，所以他的一只眼从此失去了光明。

后来，因李家离城太近，不便活动，转移到竹林唐雨村家（唐现在郑州饮食服务公司老干部科工作），竹林离城较远，所以小股土匪多如牛毛。如陈万诚、严纪洲、汤寇斋等，各立山头，烽烟四起。剑仇同志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以商人的身份，利用关系和各股土匪打交道。同时和我们几个保特联

系，了解敌情，给党贡献了大量情报。

四三年，我随邵鸿基在青岗驻防，当时八路军正在范庄攻打邵的上司杜淑，杜、邵惶惶不可终日。青岗内外，戒备森严。冯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去青岗，居住三天，夜间亲自侦察，把邵的军事部署搞的一清二楚。借我领人出去摧粮之机，离开了青岗，我把他送到凡相才分了手。

杜、邵败北后，南窜林庄。我在老家（杜楼）潜伏时，记得约是八月初的一天，剑仇找我指示工作。我俩正在谈话，日伪突击队突然包围了我村，要来抓我。我催他快跑，他却胸有成竹的说：“我有证，是商人，他们不认识我，又不是为我而来，你和嫂子快跑吧！我来掩护。”结果，他被敌人捉住，用裹脚绑在我院内的一个拖车上，严加审问。他一口咬定是商人，敌人没办法，只好放了他。此后我又去林庄。

是年冬，八路军的两个步兵团，从西路马村、常村一带，一个骑兵团从沿河一带，进攻林庄。在部队出发前，冯准备先到油房寨找我（当时我在油房寨住）联系。途经陈寨时，被赵子安手下的一个王连长扣留，王得知是我的朋友，便放了他，并给开了通行证。见面后，谈了情况。我俩便以游玩为名，去接大部队。至戚寺南地接着了大部队，我俩又作向导，直捣龙相，和赵子安接上火之后我们才去油房寨。

四四年秋，我在林庄东小寨驻扎时，冯去找我谈工作，路过金寨集，喝茶时，被一个曾为我军俘虏，听过冯讲话的王守典发现。他马上报了告，当时的兵站办事处主任张孝增，派通信员小四随王守典前往，追到村西把剑仇逮捕了。由于

王的死证，剑仇一身是嘴也难说清，于是把他送给了何冠三。

翌日上午，何冠三的警卫员高勤书，到小寨通知我，说司令叫我马上去林庄。我问他什么事，他也不说。到路上遇见便衣队长侯朝东，才知底细。

见何后，我说冯是我的朋友，抗战初期扩军时认识的。这几年来经常来往，只知道他是个商人。何说：“看你那个马虎劲，他是个大共产党员，连他自己都认帐了。既然如此你去看看他吧。”我说：“好吧，朋友一场，那就见一下吧。”当我快进押剑仇的屋时，发现后边有人。剑仇被吊在屋梁上，浑身血迹斑斑。他见到我时先说对不起我。我说：“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他说：“当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早几年我就想到会有今天，你不必为我担心。只是有一件事请你帮忙，你给家里捎个信，就说我的帐没有要过来，得急病死了。只是老人全靠兄弟们奉养，我心里有愧。”我听了这句话，差一点没哭出来。只因窗外有耳不便多说，道了声“珍重”我就退出来了。

回去后，马上向组织汇报了情况。经过反复磋商，决定用统战的方法营救。找当时的名流士绅傅广先、侯玉堂等和何交涉。何提出，要用五挺机枪交换。当我们答应后，何又以为冯是个大共产党员，不杀了恐有后患，把剑仇同志活埋在榆林头东地。从此我们党失去了一个好同志。

郑大信在长垣

邢 范 之

1928年（民国17年）冯玉祥主豫期间，其部队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经长垣北上时，留一个营驻长垣，并派郑大信任长垣县长（当时长垣归河北省管辖，但在战乱时期，军队往往自派地方官）。郑大信，滑县大范庄人，保定农专毕业，当时年龄不足40岁。他在长垣作风正派，平易近人，兴利除弊，关心民疾，生活朴素，处事果断，大有冯玉祥将军的作风。在长垣任职仅半年，却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实事。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尤其是处于战争年代，身为县之长的郑大信却无半点官气。处理政务，不拖拉，不迁就，雷厉风行。他在县政府大堂的柱子上悬挂了一幅木质楹联，上联是“今天要办的事决不等到明日”，下联是“自己能做的事绝不委给别人”，文词虽太不雅，但教育意义极为明显。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的带动下，公职人员的办事效率有明显提高。夏季，他常身着白制服，手摇小蒲扇，徒步于街巷闾里，与群众席地坐谈，了解民间疾苦。倘遇民事争端，不论有无状纸，就当场处理，群众极为称颂，一时传为佳话。平时受理案件，都是约定时间让当事人

按期到庭听审，并尽快予以解决。传案的差役更不敢从中勒索财物。他给代写状纸的“代书铺”规定收费标准，不准额外索费。旧政府有些差役染有鸦片烟瘾，无钱时抽不上鸦片，就煮米壳（罌粟壳）水解瘾。郑大信见他们手提米壳桶，从大门出出进进非常反感，就请医生配制戒烟药发给他们服用，确也有些人就此戒除了烟瘾。

郑大信在长垣还办了两件突出的事，一是破除迷信毁神像，再是禁止妇女缠足。他在很多场合，大讲科学道理，劝人们不要迷信鬼神，还宣传妇女缠足的害处，号召妇女不要缠足。在一个星期日上午，他发动各机关公职人员和各学校师生，组织破除迷信大军，集合在县府大堂前，讲话后，亲自率领到北街城隍庙将几百个大小神鬼偶像全部打毁，并搬出填坑。这一行动对全县震动很大，各乡的神庙偶像亦相继毁掉。大庙改作学校或辟作公用，小庙予以拆除。在禁止妇女缠足方面，他更不遗余力。成立了指导妇女放足委员会，张贴了布告，禁止年在40岁以下的妇女缠足，原来缠足的限期统统放开。先从学校入手，劝导女教师、女学生放足，再由点到面扩展到全县城乡。为了扩大影响，大造舆论，发动男学生不要同缠足女子结婚。又印制了小型布质臂章（约长7厘米宽2厘米），白地兰边兰字，上边印有“誓不与缠足女子结婚”字样，分发给男学生佩带。并利用星期日和假日，组织女教师率领女学生深入各家各户挨门检查。遇有缠足不放的，就当场将其缠足布扯下，同时警告其家长，如再不放给以惩罚。经过三番五次的查禁，震动了全县。从此，传统的缠足陋习，逐渐得到革除，广大妇女的缠足痛苦亦随（下转第33页）

济世活人的女医师

陈 振 宇

在芦岗方圆十几里的村庄内，“四老奶”用土单方给妇女儿童治病的事迹广为流传。

四老奶，原名李素真，家住长垣县芦岗乡东程庄村。因其丈夫排行第四，故人称“四大娘”，随着年龄与德望日隆，称呼也依次改为“四奶”、“四老奶”。她生于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卒于1972年，享年93岁。

地处黄河滩区的芦岗，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洪水与瘟疫是人民仅次于饥饿的两大灾难，缺医少药，无钱治病，更增加了农民的困难。死婴遍野，目不忍睹。李素真眼见亲人与乡邻，因无钱治病而死去的惨景，不胜感慨，决心习医。从中年开始向一个亲戚——姜庄名医刘新广求教，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力，熟记医理、药性、穴位，通过长期实践，自己摸索出一套用土单方及针灸治病的简便方法，使用于临床，开始了他长达五十多年的妇科、儿科医生生涯。直到她去世的前一天还给人治病。

生于旧社会的女医师从不信巫。她通过望、闻、问、切之后，凭她的一包长短不齐的银针，和当地土产的草药，济世活人。她使用的草药除香附、车前子几味名药外，如丝瓜